

不应忘记历史的悲剧

——评《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

王卫星

李恩涵先生是台湾资深学者,1986年以前,长期从事二三十年代中国外交问题的研究。1982年,日本国内发生“审定”教科书事件,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妄图修改历史教科书,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从教科书中抹去。日本右翼分子的这一举动,使李恩涵先生深感震惊。以此为契机,李先生开始着手研究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问题,尤其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问题。经过多年努力,李先生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南京大屠杀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相关论著。1999年10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是李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

论述全面、重点突出是该书的一大特点,也是李先生一贯的作风。关于日本在中国贩毒问题,该书在地域上几乎涵盖日本在华贩毒的所有地区,其中包括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在时间上横跨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15年间。考虑到在一些地区日本贩毒活动开始较早,因此李先生在部分章节中将日本的贩毒活动追溯到1910年。这样,该书在时空上几乎涵盖了日本在华的全部贩毒活动。关于日军在华“三光作战”问题,该书也进行了全面论述,所谓“三光作战”,是指日军对华北、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扫荡战。李先生在该书中全面论述了日军实行“三光作战”的背景、原因及其后果,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日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暴行。在全面论

述的同时,该书也突出重点,例如山西和河北是日军“三光”暴行最集中的地区,因此李先生重点论述了日军在晋东北、晋东南、冀西、冀中和冀南等地区的“三光”暴行。再如1937—1945年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因此该书将这一时期也作为论述的重点。这样的结构和布局,既能让人了解日本在中国贩毒和“三光作战”的全貌,又能使人深刻理解日本在中国贩毒的实质和“三光作战”的残暴性。

客观性和公正性是此书的另一特点。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日本贩毒和“三光作战”受害国的一员,李先生并没有抱着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来研究加害国的罪行和暴行,而是客观公正地分析、研究和揭露侵略者罪行的动因和事实,以警示后人,避免战争的悲剧重演。正如作者在该书“自序”中所言:“从我孙儿的快乐成长,使我联想到1931—1937—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在华所制造的种种暴行、罪行悲剧绝对不可重演。在这核战争威胁笼罩下的新世界,我多么希望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子子孙孙可以生活在一个安全、兴盛、快乐与充满希望的时代之中。为了保障东亚大局的和平与安全,中、日两大民族,尤其应该在未来和平共处。”该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认识也体现了客观性。以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些台湾学者对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认识不足,乃至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而李先生大量运用大陆有关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史料,肯定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地位,积极评价了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在抗战中的作用。

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不能仅仅“知其然”,而应该“知其所以然”。李恩涵对日本在中国的贩毒和“三光作战”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揭露”这一层次上,而是追根寻源,探究日本的动因和目的。该书在例举日本贩毒事实和实施野蛮的“三光”暴行的基础上,就其实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关于日本在华贩毒,李先生认为:“日本以鸦片、吗啡、海洛因

等毒品毒化中国人民的罪行,绝非日本军政机关之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国家有组织、有系统地实行之事实,系由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务、大藏(财政)、陆军、海军四相为副总裁之兴亚院所掌管或指导,作为日本国家的国策计划而展开的大规模战争犯罪(‘违反和平罪’)的行为。”对其早期贩毒的目的,李先生在书中写到:“当时日本在华贩毒的主要考虑,是为了筹集款项。因为日本自1905年战胜俄国开始立足于中国东北的南部之后,即积极致力于巩固与扩展其既得的‘权益’,并筹划侵入中国其他各地,开始派遣大量特务来华,开支庞大,需要一项稳固的财源以支持其活动;在中国贩毒赚钱,乃成为其最方便、最主要的一项‘一举两得’的财政收入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华贩毒的区域迅速扩大,其目的也因地而异。在东北,其目的在于“增加日、伪的财政收入,以应付对华全面作战与在伪满迅速扩张工矿生产与交通设备所需大量财源的需要而实施的。”在华北,李先生认为:日本贩毒之目的“除去用毒品作为筹措财源与搅乱、弱化中国社会之原来目的之外,还作为一种‘软式战争手段’;以与日军在中国各地的屠杀掠掠(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以及其他各地发生频繁的中、小规模屠杀与零星杀戮)、细菌战、化学战等‘硬式战争手段’,互为配合,作为实现日本总国策分割中国与征服中国对日本的反抗意志之下的‘分国策’;而且日本已将这种毒化政策发挥至非常全面、深入与恐怖的程度。”经过对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在华贩毒的综合分析,李先生认为,虽然日本在中国贩毒之目的有一些地区差异,但总的来说不外乎两点: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以战养战”;二是作为一种“软式战争手段”,麻痹、弱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以达到其最终征服中国的目的。书中还特别指出,抗战时期日本在其国内采取严厉的禁毒政策,而在华则完全相反,这进一步揭示了日本在华贩毒的险恶用心。

关于日军在华北的“三光作战”问题，李先生在掌握大量真实可靠史料的基础上，充分揭露了日军在华北“三光作战”的暴行，进而对日军“三光作战”的实质和目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指出：“就日军对华北游击区的‘三光作战’而论，这是对于该区内一定地区有系统、大规模杀戮非战斗人员（自然也包括战斗人员）的居民与对该地区的公私房舍、粮秣与其他物资设备彻底破坏的总称，其所表现的野蛮残暴的程度，实在人类史上留下一页不可磨灭的污迹。”抗战时期，华北地处敌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这里坚持对日游击战，给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在抗战相持阶段，日军以其主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实行“三光作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暴行。李先生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抗战的同时，还对日军实行“三光作战”的目的进行了分析，指出：“综括而言，日本军对华北游击区所实施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暴行，是想要毁灭国民政府和中共在游击区抗日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资源，其目的是要通过大规模的屠杀非战斗人员（当然也包括战斗人员）与破坏共区设防与不设防的所有设施和资财，以永久消灭中国军民的一切抗战意识和活动。”应该说此书的出版，使日本在中国贩毒和“三光作战”研究，乃至整个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

由于李先生精通多种语言，所以该书资料丰富而翔实，全书参考资料达600余种，其中包括档案、报刊、论著等等。书中言必有据，几乎每一事件、资料、数据等均有注释，便于人们查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引用英文、日文档案资料、论著等近300种之多，其中一些日文原始档案出自当时日军特务机关之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正因为有如此众多的资料作基础，使该书学术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多年来,李先生在大量阅读中、英、日文资料和论著时,将日本在中国的暴行一一收集起来,编辑成“战时(1931—1937—1945)日本在华暴行日志”,列于该书附录之中。“日志”篇幅达170页,详尽地记录了日本在华的各种暴行,其中包括化学战、毒气战等等,从而形成了该书的又一特色。“日志”不仅是日军在华“三光作战”暴行叙述的补充,而且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继续研究的线索和基本史料。

该书也有其不足之处。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于该书是由李恩涵先生早先已发表的数篇论文重新修改编辑而成,所以该书不同章节中的一些语句显得有些重复,如第41页与第73页的部分语句重复等。第二,由于海峡两岸隔绝了几十年,经过几十年的演变,两岸在中文词语及语法方面已有了一些差异,这种差异使生活在大陆的人们读台湾作者的著作时,语句上有些不习惯。当然这并不是李先生的过失。但是如果能以大陆人们习惯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更好了。

当李先生的新著《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出版之际,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又在酝酿一场旨在否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进而全面否定整个侵华战争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先生出版的新著及时显示出了强烈的针对性,它以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挑衅。

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和罪行,并不是在煽动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而是唤醒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和平意识,避免战争的罪恶重演,使世界迈向一个没有战争恐怖的未来。这是李恩涵先生撰写此书的初衷,也是每一个读者的切身感受。

(作者王卫星,1957年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兵)